

关于“生产力一元决定论”的若干理论问题

——基于经典文本的解释、辩护和重申

肖 磊

【内容提要】马克思对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法则主要采取了三种表述方式：一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对抗、冲突；二是生产关系要适合一定的生产力水平；三是随着生产力的变化，生产关系发生改变。毛泽东的解读与马克思的阐述是一致的，而阿尔都塞的“多元决定”却歪曲了基本原理的本来涵义。从实证角度来看，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产生之后生产力的巨大发展没有否定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这一基本原理，“决定性的反作用”以“决定性的作用”为前提，在封建社会解体与资本主义萌芽时期存在一个“生产力临界点”。“东方道路”不能作为生产力在事后意义上起“归根到底的决定作用”的证据，相反地，它证明了生产力一元决定论的科学性。虽然经典作家在东方道路问题上的观点有一定差异，但他们在生产力一元决定论的基本原理的认同上却是完全一致的，他们都是坚持“辩证决定论”的唯物主义者。

【关键词】 生产力 生产关系 辩证决定 东方道路

作者简介：肖磊（1981-），西南财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经济学家》编辑部副研究员（四川成都 610074）。

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关系反作用于生产力，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基本规律。这一规律必须运用唯物的、实践的、辩证的思维方法，特别是要运用唯物辩证法的基本原理进行正确解读。本文试图澄清与基本原理有关的三个基本理论问题：第一，生产力对生产关系的作用并不是事后意义上的“归根到底的决定”，也不是事前意义上的“多元决定”，而是“辩证决定”；第二，生产关系产生的“生产力前提”不同于生产关系对生产力的“决定性的反作用”，不能将反作用理解为事后意义上的“系统因果性”；第三，马克思、列宁设想的“东方道路”是一个历史发展的特殊性问题，它与英国工场手工业产生后生产关系对生产力的“决定性的反作用”不是同一个问题，不能等同视之，不能用“东方道路”的特殊性否定“生产力一元决定论”的普遍性。

一、正确理解经典作家关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的有关论述

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法则是马克思历史研究的主线，也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基本规律。马克思有时将其直接看作“生产资料与生产关系”的关系，有时将其称为“生产力与交往形式”的关系，有时称作“生产力与社会关系之间的联系”。特别地，马克思还直接将二者之间的关系称为

“生产力（生产资料）的概念和生产关系的概念的辩证法”^①。从经典文本来看，马克思对基本原理的具体表述主要有以下三种方式。

一是直接表述为生产力与生产关系（或交往形式、社会形式）的对立、矛盾、冲突、对抗等。这种用语在马克思的著作中是最常见的。根据马克思的表述，生产关系是人们在其中获得一定生产力的“社会形式”^②，生产力在一定的生产关系中运动，当生产力发展到与生产关系不能相容的地步时，二者之间就会通过斗争和对抗的形式表现出来。因此，在这里，生产力与生产关系表现为社会经济运动中对立的两个方面。

二是采用“适合”或“适应”等语词来表述二者之间的关系。这也是马克思经常使用的表达方式，斯大林将其概括为“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性质的规律”。这种表述的涵义在于：生产力是历史发展的基础，是既定的历史条件；生产关系作为生产和生产力借以实现的“社会形式”，它只能对生产力起适合或不适合的功能性作用，因而生产关系依据生产力的发展而改变，生产关系依据生产力而具有不同的形式。这是理解二者之间的内在联系的关键点，马克思有专门的解释。在致安年科夫的信中，马克思指出：“人们不能自由选择自己的生产力——这是他们的全部历史的基础，因为任何生产力都是一种既得的力量，是以往的活动的产物……他们的物质关系形成他们的一切关系的基础。这种物质关系不过是他们的物质的和个体的活动所借以实现的必然形式罢了……人们永远不会放弃他们已经获得的东西，然而这并不是说，他们永远不会放弃他们在其中获得一定生产力的那种社会形式。恰恰相反。为了不致丧失已经取得的成果，为了不致失掉文明的果实，人们在他们的交往〔commerce〕方式不再适合于既得的生产力时，就不得不改变他们继承下来的一切社会形式。”^③

三是采用“随着……，则……”的语句来论述二者之间的关系。这种论述表达的是一种典型的“时序因果关系”，即生产力的发展在前，生产关系的变革在后，生产力发展是引起生产关系变化的根本原因。马克思采用这种表述的情况比前面两种要少一些，但观点是没有变的。马克思多次指出，生产力的变化引起生产方式的变化，进而引起生产关系的变化，例如，“社会关系和生产力密切相联。随着新生产力的获得，人们改变自己的生产方式，随着生产方式即谋生的方式的改变，人们也就会改变自己的一切社会关系。手推磨产生的是封建主的社会，蒸汽磨产生的是工业资本家的社会”^④。

除了这些表达方式之外，马克思还使用了其他的一些语词，但并不是太常见。例如，有时也采用“决定”或“制约”等语词来表达二者之间的关系。这些表述同上面的三种论述并不矛盾，只是换了一种说法而已。同时涵盖三种表述的概括性总结是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提出的，马克思认为，这是指导他的整个研究的总的结果。可见，马克思确实是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看作人类社会发展中对立统一的两个方面，并且将其相互之间的运动视为质变与量变、对立统一和否定之否定的过程。在黑格尔的《逻辑学》中，质变量变规律属于“存在论”的范围，而对立统一规律属于“本质论”的范围。但这两个规律并不是相互外在的规律。在同一的生产过程中，不存在没有生产关系的生产力，也不存在没有生产力的生产关系，二者统一于具体的生产活动之中。

用“决定与反作用”来概括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关系，强调的是二者之间的作用方式在无数的相互作用中所具有的根本性和主导性。“决定与反作用”是相互作用的主要形式，是在无数的

①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33-34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43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43-44页。

④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602页。

相互作用中起支配作用的方式。没有相互作用，也就没有所谓的辩证决定；同样地，没有辩证决定，也就没有具体的相互作用。相互作用始终只是比辩证决定更为一般的概念，它表达的是事物之间的“普遍联系”。辩证决定与相互作用的关系，实际上就是事物之间“内在联系”与“普遍联系”的关系。在《资本论》中，马克思使用了“决定性的反作用”这样的语词：“从直接生产者身上榨取无酬剩余劳动的独特经济形式，决定了统治和从属的关系，这种关系是直接从生产本身中生长出来的，并且又对生产发生决定性的反作用。”^①

这里，生产关系对生产力的“决定性的反作用”，是以承认生产力对生产关系的“决定性作用”为前提的。“决定性的反作用”只是而且仅仅表明，不改变旧的生产关系，新的生产力就不能获得发展，新的生产关系只是在旧的生产关系中成长起来的生产力的发展条件。在这个意义上，在辩证作用的具体环节上，也可以说，生产关系是决定性的，是矛盾的主要方面。所以，马克思指出：“从资本的观点来看，资本以前的各个生产阶段都同样表现为生产力的桎梏。而资本本身，如果理解得正确，只有当生产力需要外部的刺激而这种刺激同时又表现为对生产力的控制的时候，才表现为生产力发展的条件。”^②这句话表明了“决定性的反作用”的真正涵义。毛泽东对这一观点有过明确的论述：“诚然，生产力、实践、经济基础，一般地表现为主要的决定的作用，谁不承认这一点，谁就不是唯物论者。然而，生产关系、理论、上层建筑这些方面，在一定条件之下，又反过来表现为主要的决定的作用，这也是必须承认的。当着不变更生产关系，生产力就不能发展的时候，生产关系的变更就起了主要的决定的作用……这不是违反唯物论，正是避免了机械唯物论，坚持了辩证唯物论。”^③

这是从矛盾的主要方面和非主要方面的相互转化的角度来讲的，要说明的是矛盾的特殊性。“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是“一般条件下”的普遍规律，而“生产关系的决定性的反作用”则是“在一定条件下”的特殊情况，这个“一定条件”就是指不变更生产关系、生产力就不能发展的时候，是在生产关系成为生产力发展的桎梏的时候，是在矛盾双方处于对立状态的时候。这恰恰不是否定生产力的首要性和发展性，而正是表明了生产力对生产关系的支配作用。虽然旧的生产关系在一定时间内阻碍新的生产力的发展，但是新的生产力并不是凭空产生的，它是在旧的生产关系的母体中孕育成长的，它是旧的生产力在旧的生产关系中发展的结果，而旧的生产关系在成为生产力发展的障碍之前正是通过促进生产力发展而获得历史合法性的。

在此，不能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关系理解成主要矛盾和非主要矛盾的关系，从而将生产力一元决定论理解成主要矛盾起决定作用。生产力一元决定论是指，作为“统一体的一个方面”的生产力在一般条件下起决定性作用、起支配作用，而生产关系对生产力的“决定性的反作用”，则是以生产力的决定性作用为前提条件和先在条件的，因此，在特殊条件下，当生产关系成为矛盾的主要方面起支配作用的时候，即当生产关系阻碍生产力发展的时候，生产关系的变化就会对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产生决定性的反作用。在社会历史进程中，生产力和生产关系谁占主导地位，是随着具体条件而变化的，并且这种变化是朝着自己的对立面转化的。当原来的主要方面变成非主要方面，原来的非主要方面变成主要方面，矛盾也就随之变化，旧的矛盾为新的矛盾所代替，但是这种变化并不是单纯的重复，而是否定之否定。这就完全不同于多元决定论。

现实中人们理解的多元决定论又分为两种：一种是主张多种因素作用于同一事物的“多因素

①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894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96页。

③ 《毛泽东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325-326页。

论”，另一种则是主张事物是多种矛盾的统一体，因而事物的发展进程是多种矛盾共同决定的，这就否定了根本矛盾（例如社会发展中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和基本矛盾（例如资本主义社会中的生产的社会化与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的决定性作用，否定了必然性，这种决定论就是阿尔都塞的矛盾的“多元决定”，用现代的表述方式可称之为“系统决定”或“有机决定”。

毛泽东指出，“在复杂的事物的发展过程中，有许多的矛盾存在”，在不同的情况下，主要矛盾和非主要矛盾的地位发生变化，但不管怎样，“其中必有一种是主要的，起着领导的、决定的作用，其他则处于次要和服从的地位”，“事物的性质，主要地是由取得支配地位的矛盾的主要方面所规定的”^①。虽然毛泽东这一论点启发了法国哲学家阿尔都塞，但阿尔都塞提出的“矛盾与多元决定”却完全不同于毛泽东的决定论。阿尔都塞的多元决定论强调的是事物的进程是由多种矛盾所构成的统一体，从而反对黑格尔式单一的矛盾决定的辩证展开体系（历史和逻辑相统一）。阿尔都塞认为，黑格尔的矛盾是单一的矛盾决定论，因而是抽象的和不现实的，马克思对黑格尔辩证法合理内核的吸收不在于唯物主义的“颠倒”，而在于真正地改造了辩证法的内在结构，从而形成了一种包含经济基础、上层建筑及其他方面各种矛盾对历史进程的多元决定，即“在各有关领域中活动的‘不同矛盾’”并不是像黑格尔辩证法中那样构成“一个简单矛盾的内在统一体”，而是在“构成统一体的同时，重新组成和实现自身的根本统一性，并表现出它们的性质：‘矛盾’是同整个社会机体的结构不可分割的，是同该结构的存在条件和制约领域不可分割的；‘矛盾’在其内部受到各种不同矛盾的影响，它在同一项运动中既规定着社会形态的各方面和各领域，同时又被它们所规定”^②。

阿尔都塞的这一观点虽然表述得极其复杂和费解，但实际上就是毛泽东关于主要矛盾和非主要矛盾思想的极端化。如果将黑格尔的方法理解成“历史和逻辑相统一”的客观唯心主义的历史辩证法，那么阿尔都塞的辩证法则是一种以“矛盾”为核心的“共时性”的辩证法，它着眼于历史进程中某一时刻（横断面）存在的各种矛盾的复合体的性质。这显然并不是马克思辩证法的全部，将其视为马克思辩证法的基本结构，是对马克思思想的极大误解。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的辩证法，不仅遵循了历史和逻辑相统一的方法达到范畴的自己运动，而且对黑格尔的《逻辑学》的结构进行了科学改造，马克思完全克服了卢卡奇所指责的黑格尔生硬地将范畴塞进“正反合”的框架中的毛病。毛泽东的《矛盾论》是对列宁的辩证法思想的继承和发展，他所论的矛盾包括“各个物质运动形式的矛盾，各个运动形式在各个发展过程中的矛盾，各个发展过程的矛盾的各个方面，各个发展过程在其各个发展阶段上的矛盾以及各个发展阶段上的矛盾的各个方面”^③，因而绝不是阿尔都塞所论述意义上的多元决定论。同时，毛泽东的“矛盾”概念也存在层次性，不同矛盾的普遍性程度是不同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属于人类社会发展中的根本矛盾，而生产的社会性与占有制的私人性的矛盾属于资产阶级社会的基本矛盾。这是同阿尔都塞的多元决定论完全不同的。马克思的“生产力一元决定论”与毛泽东对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辩证理解没有任何实质性的区别。

阿尔都塞不赞成恩格斯的命题——“历史过程中的决定性因素归根到底是现实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④，这就表明了阿尔都塞所理解的马克思的辩证法不同于马克思的。恩格斯的解释可以重新表述为：第一，人们在一定的前提下创造历史，其中，经济条件是决定性的，政治、意识等条件起

① 《毛泽东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320、322页。

② [法]阿尔都塞：《保卫马克思》，顾良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6年，第88、89页。

③ 《毛泽东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317页。

④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91页。

作用，但不起决定性作用，政治归根到底是由历史的、经济的原因而产生和发展起来的；第二，历史是由许多的单个人的具有冲突性的意志的合力而形成的不自觉的结果，单个人的意志归根到底是由经济情况所决定的生活条件造成的。恩格斯的特别说明，所针对的是机械的、单一因素的“经济决定论”观点，其论证的逻辑是要解释什么因素决定了历史斗争或者说政治上上层建筑和国家的进程或事件。在这个意义上，经济运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归根到底决定了历史的一般进程和总体趋势，而这种决定是通过无穷无尽的偶然事件实现的，众多因素的相互作用与经济运动归根到底的决定作用并不矛盾，相反，经济运动的必然性恰恰是通过偶然性为自己开辟道路的，是通过无数的偶然因素的相互作用而实现的。所谓的“归根到底”，指的是由经济运动造成的社会发展的一般趋势在背后作为偶然事件或者各因素相互作用的内在根据而间接地、有中介地发挥作用。非本质条件能够改变事物发展的个别外貌，但经济状况决定事物发展的一般进程。

在1894年的一封信中恩格斯进一步给出了“归根到底”的解释，这种解释包括三个方面：第一，作为全部社会历史决定性基础的经济关系不仅包括生产和交换的方式，而且包括全部技术、地理环境、各种残余经济成分和外部环境；第二，政治、法律、宗教等因素相互之间发生相互作用并对经济基础发生作用，“是在归根到底不断为自己开辟道路的经济必然性的基础上”发生的；“通过各种偶然性来为自己开辟道路的必然性，归根到底仍然是经济的必然性”；第三，经济状况并不是自动地发生作用，而是人们在既定、制约他的环境中，在现有的现实的关系的基础上，在一个有明确界限的既定社会内，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其中，经济关系不管受到其他关系的多大影响，它在归根到底的意义上都是决定性的，是“贯穿始终的、唯一有助于理解的红线”^①。对于这一更为明确的解释，阿尔都塞没有提及，所以，他的反驳的文本依据是片面的。恩格斯的特别说明只是用另一个方式解释了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而并没有对基本原理添加新的内容。因此，不能将恩格斯的解释理解为生产力在事后意义上起归根到底的决定作用，更不能将其理解为机械决定论意义上的最后的决定因素。

二、正确理解资本主义产生的“生产力前提”

前面是一般理论的探讨，下面将具体分析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产生的生产力前提以及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对生产力发展的决定性的反作用。由于这种反作用的显著性，人们容易产生这样的看法：在英国资本主义形成过程中，先产生了工场手工业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后来才有了机器大工业的生产力发展，正是由于生产力的事后确认才使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获得有机转变，或者说“系统性转变”，因而生产力在事后起归根到底的决定作用。事实上，这一论述忽略了两个极为重要的问题：一是工场手工业中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产生的生产力前提，也就是说，在这种生产关系发生反作用之前，是由于生产力发展造成了生产关系的转变；二是机器的生产力基础问题，机器的产生是工场手工业分工的结果，是从工具的结合开始的，而工场手工业的企业内分工则是建立在行会手工业社会分工的基础上的，这里面有一条明确的生产力变化的线索，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产生、发展及统治地位的形成都密切地与生产力发展的这一连续的线索相联系着。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研究了工场手工业的劳动方式如何产生机器大工业的生产力前提，即在工场手工业中由于精细的分工而产生的劳动工具特别是复杂的机械装置如何孕育出机器，从而首先

^①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667-669页。

实现劳动资料的变革，这是大工业的起点。同时，马克思也指出了工场手工业的生产力前提，就是劳动力和生产资料的规模的扩大、劳动力在生产上的集中，正是这种规模较大的生产才导致了以分工为基础的工场手工业的形成，这可理解为“生产力的量变”^①。马克思认为，工场手工业是资本主义时代的开始，在时间上大致从16世纪中期持续到18世纪最后30年。而以简单协作为基础的手工场则是资本主义的萌芽时期，萌芽是一种过渡性质的生产方式，在这种生产方式中，“劳动对资本的从属只是形式上的，就是说，生产方式本身还不具有特殊的资本主义的性质”^②。

资本主义萌芽是一种普遍的现象，是商品经济发展的产物，凡是商品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都会产生一些劳动力集中并在形式上受商业资本控制的雇佣劳动现象。但是，“萌芽”是种子，是内因，是一种内在的必然性，它要借助外部条件才能生根、开花和结果。西欧最早发生资本主义萌芽的意大利、荷兰被后进的英国所超过，其原因恰恰在于各种外因或偶然因素的差异。这些因素中，起主要作用的仍然是生产力方面的。

第一，最初引起生产力量变的因素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从15世纪最后30多年开始的并持续到整个16世纪的农业革命；另一个是“15世纪末各种大发现所造成的新的世界市场的贸易需要”^③。第一次农业革命奠定了英国工场手工业的生产力条件，正是由于“农业革命对工业的反作用”才导致了“工业资本的国内市场的形成”^④。没有农业生产力的进步，就没有商品经济的进一步发展，也就没有商业资本的最初积累。“剩余价值的全部生产，从而资本的全部发展，按自然基础来说，实际上都是建立在农业劳动生产率的基础上的。”^⑤英国史学家的研究表明，从根本上改造英国传统农业面貌的农业革命发生在16世纪，至17世纪结束，而不是像传统观点认为的那样发生在18和19世纪^⑥。

地理大发现之后开始的世界市场革命，是促使英国资本主义形成和发展的另外一个重要的生产力条件。之所以说这是一个生产力条件，是因为地理大发现是航海技术进步的结果，地理大发现为新的市场和新的生产资料来源提供了可能性。地理大发现改变了世界市场的航线，破坏了意大利北部的商业优势，使英国成为世界市场的中心，这是英国商业发展的最重要的外部因素，也是英国超过意大利成为资本主义诞生地的主要原因。世界市场的建立使英国毛纺织产业获得了快速发展，毛纺织产业的发展带动了养羊业的发展，进而成为推动15世纪末至16世纪前半期第一次圈地运动高潮的直接原因。圈地运动不仅造成劳动者和生产资料的分离、工场手工业和农业的分离，为农村工业和沿海城市的工业提供了大量雇佣劳动者，而且成为解放束缚农业生产力的生产关系的重要推动力，使农业真正地成为资本主义性质的大规模农业。

第二，在英国资本主义形成过程中，人口数量变化也是一个重要的生产力条件。14世纪发生的“黑死病”使英国的人口几乎减少一半，人口数量的剧烈减少是促使英国庄园经济制度解体并导致“敞田制”广泛存在的直接原因，而“敞田制”是圈地运动的直接的制度前提。历史资料显示，圈地运动并没有导致农业生产的下降，英国的农业产量一直在快速增长，这说明尽管大量公田和自耕地被圈占，但农业劳动生产率也在快速提高。15世纪中叶到16世纪中叶英国人口的快速增长，为农业和工业资本主义发展提供了大量劳动力，而农业革命则保证了新增人口的物质需要，打破了农

① 赵磊：《历史唯物主义研究中的得与失——与孟捷教授商榷》，《政治经济学报》2017年第9期。

②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847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860页。

④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854页。

⑤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888页。

⑥ 参见侯建新：《工业革命前英国农业生产与消费再评析》，《世界历史》2006年第4期。

业生产的“马尔萨斯陷阱”，使整个经济呈现出人口增长、市场扩大、生产力进步三者协同发展的局面，为工场手工业提供了生产力前提。

由此可见，英国资本主义萌芽和工场手工业的产生都是生产力发展的结果，都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对立运动的产物。虽然以工场手工业为基础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对生产力的革命性突破产生巨大促进作用，但在发生这种决定性的反作用之前，生产关系却是生产力发展的结果，因而最终还是生产力的决定作用居于优先地位。

“生产力一元决定论”包括决定和反作用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生产力发展到一定水平导致旧的生产关系趋向解体；第二个阶段是新的生产关系促进生产力发展，对生产力发生“决定性的反作用”。在社会历史发展中，后一阶段很重要，但绝不能忽视前一阶段的重要性和根本性。毛泽东说：“生产关系的革命，是生产力的一定发展所引起的。但是，生产力的大发展，总是在生产关系改变以后。”^① 这一论述准确地概括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辩证关系。那么，能否颠倒过来用事后的“决定性的反作用”的胜利来论证事前的生产关系变革的合法性？生产力发展到什么水平才能够导致生产关系的变革？第一个问题我们在下一部分论证东方道路时进行探讨，第二个问题马克思已经给出了答案。

马克思曾经反复强调这样一种观点：“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结构是从封建社会的经济结构中产生的。后者的解体使前者的要素得到解放。”^② 这是一种辩证的理解方式，即将封建社会的解体与资本主义社会的产生看作同一进程的两个方面，生产力的发展既是引起封建社会解体的原因，也是导致资本主义萌芽的原因，即旧的生产力在旧的生产关系中的发展，并受到旧的生产关系的束缚，而新的生产关系的形成以旧的生产关系的解体、生产要素的游离和解放为前提，不管是旧的生产关系的解体还是新的生产关系的形成，“只有在物质的（因而还有精神的）生产力发展到一定水平时才有可能”^③。因而，物质生产力是必要条件。

进一步地，可以说，在解体和形成的同一过程中，导致生产关系的变革的必要条件，只需要生产力达到使旧的生产关系不能维持再生产（逐渐解体）而新的生产关系可以在形式上存在（萌芽）的临界点。马克思说：“资本关系本身的出现，是以一定的历史阶段和社会生产形式为前提的。在过去的生产方式中，必然发展起那些超出旧生产关系并迫使它们转化为资本关系的交往手段、生产资料 and 需要。但是，它们只需要发展到使劳动在形式上从属于资本的程度。”^④ 马克思还说：“就生产方式本身来说，例如，初期的工场手工业，除了同一资本同时雇佣的工人人数较多而外，和行会手工业几乎没有什么区别。行会师傅的作坊只是扩大了而已。”^⑤ 这些表述说明，生产力发展的临界点也就是新旧两种生产关系的临界点，在这个临界状态中，旧的生产方式被赋予一种形式上的新的社会属性，从而呈现为一种过渡形态，这种过渡性质的社会形式就是我们经常所说的“萌芽”。马克思曾经详细地描述过货币转化为资本的各种“原始的历史形式”、各种中间类型和混合类型及其过渡方式^⑥，马克思还详细地描述了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生产力、生产方式和生产关系变化的历史

① 《毛泽东文集》第8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132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822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55页。

④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9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126页。

⑤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374页。

⑥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64-166页。

程^①，如果将这一历程提炼成普遍化的表述，即可视为生产力和生产关系运动的一般规律、一般理论：生产力达到临界点，旧的生产关系解体，新的生产关系形成；生产要素在新的生产关系中组合，使生产方式（即劳动方式）发生变化；变化了的生产方式一方面创造新的物质生产力，另一方面使自己在新的物质生产力的基础上得到发展，从而产生彻底的经济革命；经济革命一方面使新的生产关系普遍化和现实化，另一方面则发展出更高水平的劳动生产力、生产条件和交往关系，造成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尖锐化，进而为新的生产方式创造现实条件，为新的社会形态、新的社会生活过程创造物质基础。

这一理论可称为“生产力的临界点理论”，它从另一个角度具体地解释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辩证关系，从而区别于“生产力—生产方式—生产关系”以及事后意义上的“生产力有机决定论”两种解释模式。

三、正确理解经典作家关于东方道路问题的论点

所谓东方社会发展道路，具体来讲，包括三个相关的问题：一是马克思研究的亚细亚生产方式的特征及其在社会形态演变中的定位，二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对俄国农村公社能否跨越“卡夫丁大峡谷”的理论设想，三是列宁对俄国十月革命和俄国社会主义道路的理论解释。第一个问题涉及社会形态演变的顺序和东西方差异的问题，本文不做探讨。第二个问题和第三个问题是直接相关的，本文中的“东方道路”主要是指俄国社会主义发展的道路问题，也就是跨越“卡夫丁大峡谷”问题。

19世纪70年代俄国的学者和理论家对俄国的发展道路问题发生了争论和分歧。1881年2月16日，查苏利奇致信马克思，请求马克思说明对俄国农村公社的可能命运以及世界各国必然经历资本主义生产各阶段理论的看法。在《给维·伊·查苏利奇的复信草稿》的初稿中，马克思论证了俄国农村公社跨越“卡夫丁大峡谷”在理论上的可能性：“因为它和资本主义生产是同时代的东西，所以它能够不通过资本主义生产的一切可怕的波折而吸收它的一切肯定的成就……和控制着世界市场的西方生产同时存在，使俄国可以不通过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大峡谷，而把资本主义制度的一切肯定的成就用到公社中来。”^②但是，马克思认为这只是一种纯理论上的可能性，能否实现取决它所处的历史环境。

实际上，早在1877年《给“祖国纪事”杂志编辑部的信》中，马克思已经提出俄国不必走西欧资本主义发展道路：不能把“关于西欧资本主义起源的历史概述彻底变成一般发展道路的历史哲学理论”，不能认为“一切民族，不管他们所处的历史环境如何，都注定要走这条道路”，如果那样做，“会给我过多的荣誉，同时也会给我过多的侮辱”^③。

马克思1877年和1881年的主要观点，是通过俄国革命掌握国家政权，来首先消除各种对农村公社的破坏性力量并保卫农村公社的存在，使其具备自由发展的条件。同时，马克思也明确地提到，以世界市场为中介吸收资本主义的肯定成果（主要是生产力）的设想^④。在致查苏利奇的复信草稿

①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9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126页；《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46-547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3年，第431、435、436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3年，第130页。

④ 参见王东：《晚年马克思新解》，《教学与研究》1996年第5期。

的第二稿中，马克思仍然保留了这个观点^①：“俄国是在全国广大范围内把土地公社占有制保存下来的欧洲唯一的国家，同时，恰好又生存在现代的历史环境中，处在文化较高的时代，和资本主义生产所统治的世界市场联系在一起。俄国吸取这种生产方式的肯定成果，就有可能发展并改造它的农村公社的古代形式，而不必加以破坏（我顺便指出，俄国的共产主义所有制形式是古代类型的最现代的形式，而后者又经历过一系列的进化）。”^②

但是恩格斯认为，必须先有西欧无产阶级革命的成功，才能够为农村公社提供样板，才能够保卫农村公社并缩短俄国进入共产主义社会的时间，减轻转变的痛苦，因此，能够改造俄国农村公社的只有西欧资本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所以，我们发现，在马克思恩格斯共同署名的《共产党宣言》俄文版序言中，结论变成了如果俄国革命“成为西方无产阶级革命的信号而双方相互补充”，俄国农村公社的土地公有制可以成为共产主义的起点。而马克思在复信的草稿提到的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内部矛盾越来越尖锐，处于危机、对抗、冲突状态，没有提到过西方资本主义制度的变革或革命。

这些观点，后来恩格斯在1893年2月24日和10月17日致丹尼尔森的两封信中又进一步阐述了：“在俄国，从原始的农业共产主义中发展出更高的社会形式，也像任何其他地方一样是不可能的，除非这种更高的形式已经存在于其他某个国家，从而起到样板的作用。”^③在1894年《“论俄国的社会问题”跋》中，恩格斯说：“对俄国的公社进行这种改造的首创因素只能来自西方的工业无产阶级，而不是来自公社本身。西欧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胜利以及与之俱来的以公共管理的生产代替资本主义生产，这就是俄国公社上升到同样的发展阶段所必需的先决条件。”^④

如果按照马克思之前的观点，通过世界市场的联系而获取资本主义的肯定成果，那么西方资本主义的消灭就不一定是前提条件。但是，恩格斯在后来的文献中（1893年给丹尼尔森的两封信以及1894年的《“论俄国的社会问题”跋》）却认为这一前提条件是马克思和他共同的想法：“无论他还是我都认为，实现这第一个条件，是外部的推动，即西欧经济制度的变革，资本主义在最先产生它的那些国家中被消灭。”^⑤

对于这种分歧的一种可能的解释是，马克思在致查苏利奇的信的草稿中设想另外一条道路，即以世界市场为中介，利用资本主义的肯定成果，跨越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大峡谷，但马克思最终放弃了这种想法，而采用了和恩格斯相同的观点。这也可能就是马克思为什么就这封信写了三个草稿，而最终只给出一个简短结论的原因。

俄国十月革命以后，第二国际认为当时俄国的生产力水平和文化水平没有达到社会主义的高度，列宁则提出另外的命题：“我们为什么不能首先用革命手段取得达到这个一定水平的前提，然后在工农政权和苏维埃制度的基础上赶上别国人民呢？”^⑥之所以发生这种争论，原因在于俄国十月革命建立在对世界革命近期到来的预期之上，但后来西欧发达地区的革命没有成功，于是，革命后的苏联就面临在一国能否建设社会主义和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列宁的命题实际上与马克思曾经产生而最终放弃了设想是一致的，但列宁并没有提到马克思关于跨越“卡夫丁大峡谷”的设想。列

① 在第三稿中没有提及这个观点，但保留俄国农村公社与资本主义是同时代的这一历史条件的说明。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3年，第444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664页。

④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5年，第500页。

⑤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649页。

⑥ 《列宁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777页。

宁认为，革命是必然的，也是必要的，世界发展的一般规律并不排斥个别发展阶段的特殊性，反而以这种特殊性为前提。

列宁的解释搁置了“生产力要达到何种程度才能保证新生的社会具有可持续性”这一重要问题。实践表明，促使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解体的“临界”生产力水平似乎要到自动化、信息化、智能化时代才能出现，社会主义要保持与世界市场的联系才能够获得资本主义的肯定成果。这两个条件在当时的苏联都不具备。相反地，苏联没有完成的事情，当代中国却在逐渐完成，“中国道路”在一定程度上正在实现马克思的关于跨越的理论设想，并超越了苏联模式。

通过不断改革的办法调整生产关系以适应生产力发展的需要，以世界市场为中介利用资本主义的生产力，创造性地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制度设计，这些实践创造性地走出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创造了经济快速发展的世界奇迹。当前世界正在孕育第四次工业革命，人类社会已经进入信息化时代，并开始向智能化时代迈进，无人工厂、无人商店已经开始出现，信息网络正在实现需求和供给的即时反馈，自动化、智能化生产方式快速发展，新科技创新不断涌现，这些新的趋势表明，人类社会正在接近发生系统性变化的生产力临界点。资本主义制度与这种生产力的发展而产生的对人的排斥是矛盾的，这种矛盾正在尖锐化，它必将引起革命性变化；随着世界资本主义向生产力临界点靠近并逐渐趋向解体，中国对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将具有更广泛的世界历史意义和人类学意义。

马克思的设想和列宁的命题能否用生产力在事后意义上的有机或系统决定来解释呢？在马克思和列宁看来，这些观点只是“东方道路”的特殊性问题，它与基本原理并不冲突。从经典文本来看，无论是马克思、恩格斯，还是列宁和毛泽东，他们都没有在事后决定的意义上理解基本原理。恩格斯所反复提示的“归根到底的决定”指的是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指的是经济运动的必然性通过各种偶然因素的交互作用而表现出来。

诚然，毛泽东说过这样的话：“一切革命的历史都证明，并不是先有充分发展的新生产力，然后才改造落后的生产关系，而是要首先造成舆论，进行革命，夺取政权，才有可能消灭旧的生产关系。消灭了旧的生产关系，确立了新的生产关系，这样就为新的生产力的发展开辟了道路。”^①这句话，是不是表明要颠倒基本原理中的逻辑顺序才能解释历史发展的特殊性呢？显然不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不是自动地表现出来的，而是通过社会矛盾表现出来的，当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发展到一定程度，代表先进生产力的社会阶级与落后的社会阶级的矛盾就会成为社会各阶级的主要矛盾，就会产生社会变革的动力，只有当原来统治社会的宏观政治权利（政权）被革命冲击或消灭之后，上层建筑的性质发生了改变（或者是旧的上层建筑性质的改变，或者是旧的上层建筑被消灭），新的生产关系（微观的经济权利）才能广泛地建立起来，新的生产力才能得到充分地发展。这里，起决定性作用的是生产力发展，但是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却是不断发生变化的。

事前意义上的多元（矛盾）决定论或多因素决定论，以及“事后意义上的生产力归根到底的决定作用”，可以翻译成这样的表述：生产关系是生产力、阶级斗争、国家间关系等各种偶然因素共同决定的或由其中的某个单一因素决定的（否定生产力的一元决定），而这样产生的生产关系要获得一种普遍性的地位、造成社会形态的系统性转变或整体性变迁，就必须通过这种生产关系造成的生产力的优势和生产力的发展来确认，如果没有这种事后的生产力发展来保证其合法性，那么生产关系就可能倒回去，就不可持续。也就是说，只有带来生产力发展并由生产力发展来确认的生产关

^① 《毛泽东文集》第8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132页。

系才是可持续的，生产关系的产生则需要考虑各种因素造成的总和，生产力并不起决定作用，国家可以决定生产关系，阶级斗争可以决定生产关系，国家间的竞争也可以决定生产关系。按照这种观点，生产关系就是可选择的，一定的生产关系的产生也是偶然的，甚至生产关系是可以超阶段的，因此，社会发展就没有规律性可寻。这实际上是半截子的唯物主义，是唯心主义的观点。它是另外一种世界观的表现，这种观点主张事物的发展是受偶然性支配的，认为进化并不遵循一定的规律，从而否定了人类实践中的主观能动性和客观必然性的辩证关系。

四、结 语

马克思和列宁的理论设想、苏联模式及中国道路的超越，不仅没有否定“生产力一元决定论”，而且从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证明了“生产力一元决定论”的科学性。历史和实践表明，不能将生产关系对生产力的反作用解释为“生产关系的决定性作用”，也不能将“生产力的归根到底的决定作用”进一步解释为“事后意义上的决定作用”，而主张事前意义上的“多元决定论”。

通过文本的研究，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经典作家在基本原理的理解上没有实质性分歧，他们对唯物史观的认识是一致的。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在侧重点上，在基本原理的应用上，在对形势的判断上以及具体策略的考虑上，他们也是完全一致的。马克思恩格斯反复强调：“这些原理的实际运用”，“随时随地都要以当时的历史条件为转移”^①；列宁反复强调“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毛泽东反复强调“实事求是”，这些重要的提示说明了，基本原理的理解和灵活应用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它需要掌握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思想，需要达到辩证思维的高度。正如列宁所指出的，马克思主义的革命辩证法是“马克思主义中有决定意义的东西”^②，只有运用唯物辩证法来理解唯物史观，才能够把握马克思主义的精髓。马克思意义上的“决定”是“辩证决定”，无论是系统决定、有机决定，还是事后决定或归根到底地决定，都不能够完全概括基本原理中各个范畴的相互关系。

参考文献：

- [1] 孟捷：《历史唯物论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年。
- [2] 赵磊：《历史唯物主义研究中的得与失——与孟捷教授商榷》，《政治经济学报》2017年第9期。
- [3] 孟捷、赵磊：《生产力一元决定论的超越与辩护——关于〈历史唯物论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对话》，《天府新论》2017年第4期。
- [4] 丁俊俊：《两个马克思及其对当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现实意义》，《政治经济学评论》2017年第3期。
- [5] 傅筑夫：《再论资本主义萌芽——关于资本主义萌芽的几点补充意见》，《社会科学战线》1983年第1期。
- [6] 吴于廑：《历史上农耕世界对工业世界的孕育》，《世界历史》1987年第2期。
- [7] 张光明：《略论“倒过来的革命”——关于列宁的〈论我国革命〉》，《社会主义研究》2009年第5期。
- [8] 金志霖：《中世纪英国行会和雇佣工人——兼论雇佣工人与生产资料的关系》，《历史研究》1990年第6期。
- [9] 王乃耀：《十六世纪英国农业革命》，《史学月刊》1990年第2期。
- [10] 胡潇：《论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的质量对应运动》，《求索》1984年第1期。

（编辑：张建刚）

①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页。

② 《列宁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775页。